

语言研究中的 哲学问题

PHILOSOPHICAL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主 编 / 陶秀璈 姚小平
执行主编 / 王立志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语言研究中的 哲学问题

主 编 / 陶秀璈 姚小平
执行主编 / 王立志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研究中的哲学问题/陶秀璈,姚小平主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8

ISBN 978-7-5117-0504-4

I. ①语…

II. ①陶… ②姚…

III. ①语言哲学-研究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51588号

语言研究中的哲学问题

出版人 和 龔

策划编辑 蒙 木

责任编辑 高立志

编辑信箱 momofofo@sina.com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246(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66130345(网络销售)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365千字

印 张 23

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58.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如何从哲学的视角研究语言（代序）

江 怡

语言现象是人类社会最为普遍的现象，甚至被一些人看做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区别之一。虽然语言现象非常普遍，也很重要，但人们对语言现象本身却往往熟视无睹，甚至不以为然。人们最初对语言的理解，更多地是把它看作并非完善的表达思想的工具，或者是从事社会交流的手段。虽然也有人强调了语言的形式功能（如亚里士多德），还有人论述了语言的观念作用（如洛克），但他们都没有从语言现象本身入手。其实，语言从性质上说是一种活动，语言活动构成了我们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

正是由于语言活动对人类的这种重要性，所以，人类不断地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探索语言现象，试图揭示语言活动背后的奥秘。语言是如何形成的？人类的语言与动物的语言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说语言活动构成了人类生活的重要部分？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构成了社会语言学的重要内容；人类语言的发音与人类用语言表达的意义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语言的不同形式是否影响了人类的思想表达？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推动了语义学和语形学的发展；语言表达与人类的思维活动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能否从对语言表达的研究中得到对人类心理活动规律的认识？这些问题又构成了心理语言学的重要部分。总之，人类对语言现象的各种形式的考察和研究，是人类对自我认识的基础内容，也是人类文明形成和发展的核心内容。但是在以上所见的各种语言研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却是如何理解语言的性质，如何理解人类语言与人类思想之间的关系。应当说，在人类不同的历史时期，正是由于对语

言性质的不同理解，人们才会提出各种不同的语言理论。

历史地看，人类对语言性质的反思从古希腊就开始了，亚里士多德对语言形式的研究正是他的逻辑学的出发点。他把人类的理性能力归结为语言能力，并从人类的语言活动中归纳出一套完整的推理规则，由此确认语言活动为人类思想表达的主要形式。在他看来，人类的语言活动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而是极为复杂的智力游戏：当我们用语言表达思想时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理解语词的意义，因此对意义的解释就构成了语言理解的第一步。但很明显的是，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语言表达决定了我们的思想，相反，他坚持认为，思想的真理性存在于我们用语言描述的事实之中。在这种意义上，语言表达不过是我们的思想得以呈现的有力工具。这样，亚里士多德就把语言的性质理解为一种思想表达的工具。而且，这个观点一直延续到近代西方哲学，乃至到了洛克、休谟等人那里，一些错误观念的产生就被看做是由于语言混乱的结果。对语言性质的这种理解始终占据着西方近代哲学的主流，哲学家们对语言问题的讨论和解决也主要是在澄清思想表达和理解观念意义的层面上展开的。

然而，进入现代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现代逻辑的形成和发展，哲学家们对语言性质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语言问题不再是思想表达的工具，而是知识研究的唯一途径；对语言的逻辑分析不再是辅助性的哲学工作，而是哲学研究工作的主要内容。弗雷格首次提出，要把近代哲学对知识内容的研究转向对知识表达的研究，这就意味着作为知识表达形式的语言成为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对思想内容的研究变成了对思想形式的研究。罗素强调了逻辑是哲学的本质，这就把逻辑分析活动看做真正解决传统哲学问题的法宝，也是彻底解决哲学上的语言问题的主要方式。维特根斯坦则把对世界的逻辑构造看做哲学可以完成的唯一工作，把澄清命题的意义看做哲学活动的唯一内容。维也纳学派更是从认清逻辑的本质出发，强调了语言分析在哲学上的重要意义，由此确立了语言研究的哲学地位。总之，几乎所有的现代哲学家都把语言研究看做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而这种认识转变的根源则在于对语言的性质有了重新理解。

关于语言性质的讨论，从18世纪开始就成为学者们关心的重要话题。洪堡、康德等人在同时代人更加关注语言起源问题的时候，就提出了对语言性

质的理解。洪堡把语言看做是人类精神活动的灵魂，认为语言表达活动反映的是人类的精神活动。由于人类各种语言之间可以互相交流，因此人类精神活动之间一定就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决定了我们的精神结构和语言结构。应当说，这个思想与莱布尼茨的普遍语法思想之间有着逻辑关联，因为莱布尼茨的出发点就是要找到这样一个结构，使得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可以在共同的平台上得到交流。康德则明确地把语言的性质解释为人类理性能力的知性形式，通过对理性能力的批判确定语言在思想表达中的作用。可以说，近代哲学家们对语言性质的讨论更多地带有理性主义的色彩。但在现代哲学中，哲学家们则更多地强调语言的经验特征，试图通过具体的语言活动理解语言，通过对语言形式和使用的具体分析解释语言的性质。这就明显体现在以语言分析为主要任务的分析哲学家的工作中。在分析哲学家看来，由于我们对语言的理解是建立在语言分析的基础之上，因此，只有在对语言形式和用法的充分分析的基础上才能把握语言。语言分析的目的是为了澄清语言的意义，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语言，而只有达到了对语言意义的理解和把握，我们才能得到对语言性质的理解。这样，理解和解释语言的意义就成为哲学家们讨论语言性质的关键所在。

应当说，正是围绕对语言意义问题的讨论和思考，来自不同哲学传统的哲学家们才把语言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或者说，正是由于哲学家们对语言的意义有不同的理解，他们才会把对语言问题的讨论看做解决哲学问题的关键所在。无论是英美哲学家还是欧洲大陆的哲学家，他们不约而同地把揭示语言意义的奥秘看做从哲学上讨论语言问题的主要任务，由此确定了语言哲学的基本内容，即通过对语言意义的理解和解释，更清楚地认识我们所面对的世界。这样，语言哲学就成为从哲学的视角研究语言问题的专门领域。

如果从弗雷格《概念文字》（1879）的发表算起，现代西方哲学家的语言哲学研究已经走过了百余年的历程，但如果从洪堡的时代算起，西方哲学家对语言问题的研究则经历了两个世纪。从哲学家们的语言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与语言学家的思路相比，哲学家们的研究视角的确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在语言学家看来，语言研究是对人类行为研究的一部分，或者是对人类心理活动研究的一部分，因此，研究语言就是研究人类行为或心理活

动的另一种方式。但是，在哲学家看来，语言研究应当是揭示人类理性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语言本身包含了概念的运用以及推理的构成等，所以，研究语言就是研究人类理性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无论是从唯理论的角度出发还是从经验论的角度出发。洛克是经验论者中对语言问题给予最多关注的哲学家。他在《人类理解论》第三卷中专门讨论了“语词”，从观念的起源和基本形式入手，分析了语词与观念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指出了语词本身的缺陷以及人们对语词的滥用。他认为，观念是私人的，人们要交流思想，就必须用语词作为观念的记号，同时，语词也只有作为观念的标记或代表了观念，才能具有意义。洛克还认为，事物都是特殊的，不存在所谓的普遍性。所谓的共相概念可以用于特殊的事物，但它们本身不过是普遍观念的标记而已，是我们的理智发明的产物。休谟则认为，语言是我们在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产物，但我们对这种约定并没有形成某种许诺。这样，我们对语言的使用就是任意的，完全根据我们需要表达的观念性质加以确定。他把人类心灵中的一切知觉分为印象和观念，虽然简单的和复杂的观念都来自简单的印象，但我们必须用一个明确的概念才能固定心灵的印象，这个概念就是抽象观念。但这种抽象观念并不是与特殊观念相等的观念，而只是把一个特殊观念附加在一个普通名词上形成的，通过这种附加，这个名词就由于习惯的联系而对其他许多的特殊观念具有了一种关系，而且很容易把这些观念唤回到想象中来。在唯理论阵营中，莱布尼茨在《人类理智新论》中对语词问题给予了专门讨论，指出了观念与外在事物之间的非对称性以及语言的派生性，而且由于他提出了一种关于“普遍语言”的设想，这是一种建立在数学演算基础上的形式语言。根据他的设想，我们一旦拥有了这样一种语言，人们在发生争论时，就可以拿出纸和笔，根据明确的演算规则做出推算就可以了，由此就可以解决我们在思维活动中的一切争端。

由此可见，哲学家们是把语言看做人类理性活动的外在形式，对语言的研究就是对人类理性活动的研究。这里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其一，哲学家们不太关注现实的语言活动，不会去讨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使用，而是把日常的语言活动看作更为抽象的理性活动的外在表现，因而看做是一些具体实例，并没有试图深入讨论这些具体语言活动本身。这样，哲学家心目中的语言就不是我们日常使用的语言，而更多的是我们用语言表达的观念或

概念；哲学家们谈到语言的时候并不是要讨论语言的具体用法，而是关心我们用语言完成的理智行为。虽然当代哲学家们也关心语言的具体使用，但他们对语言用法的讨论仍然是为了解释语言活动背后的理智动机。其二，哲学家们对语言的讨论总是与世界的存在联系在一起。虽然语言学家也把与外部事实的存在相关联的语言意义看做语言研究的核心，但他们更关注的是语言本身。而在哲学家那里，世界的存在才是语言研究的动力所在，语言的意义在于人类对外部世界的理解。当哲学家们把意义问题看做语言哲学的核心时，他们不是在讨论意义何以可能的问题，而是关心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建构语言的意义。

其次，语言学家们更多地从微观的角度关注语言使用的具体情况，希望能够从个别案例分析中得到关于语言使用的一般规律；但哲学家们则更多地从宏观的角度考察语言的基本性质、一般形式以及语言活动与人类生活之间的普遍联系，企图通过语言分析达到理解语言意义并发现人类的理智生活与世界存在之间的普遍联系。无论是分析哲学家对语言的逻辑分析，还是欧洲大陆哲学家对语言的思想考察，都充分体现了哲学家们研究语言问题的这种独特视角。例如，赖尔和奥斯丁等人的工作，使哲学家们开始关注在日常语言的用法中隐藏着我们尚未发现的或被误解了的意义；而斯特劳森的工作更是使得用逻辑的方法分析日常语言用法成为可能。这些工作的一个卓有成效的结果是带来了一门新的学科即“哲学逻辑”。哲学逻辑不是以逻辑为对象，而是采用逻辑的方法研究语言中的哲学问题，研究哲学家们传统地感兴趣的那些概念和概念结构，研究那些与语言和思想的性质、语言结构和世界结构的关系等等相关哲学问题，如定义、命题、指称、意义、分析性、同一性、可能世界、存在和真理等等。而在欧洲大陆的哲学传统中，从洪堡、索绪尔到海德格尔、德里达、伽达默尔，再到拉康和福柯等人，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把语言图式看作人类思想图式的最直接表现，都试图从概念和命题内容入手把握语言活动核心。洪堡认为，人与人之间要交换复杂的思想必须通过共同的语言，这也是科学发展的动力和媒体。他明确指出，理解不是不可分割的点与点之间的接触，而是不同人的思想圈之间的部分重迭。这样才会有人类的思想进步，每个思想的扩展可以进入到另一个人的思想圈内，而同时又不会束缚另一个的思想。对思想的束缚只会导致反感。这是思想扩展的必须

条件。洪堡还最先提出了“语言左右思想”的观点，这对后来哲学家们的语言研究具有重大影响。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作为显现在世存在的重要方式，承担着使存在者通过言谈而解蔽真理的重要使命，同时又使得世界的存在本身在语言中得以显示。拉康则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把人类在语言活动中形成的认识图式称为“镜像”。拉康把他的理论归结为“无意识是有语言的结构”和“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即无意识有一种语言的结构，有时候以移位和压缩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可以通过其表现考察内在的无意识结构。这种无意识的结构包括自我与他人、他物之间的关系。

从这些哲学家的思想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哲学家们考虑语言问题的出发点与语言学家的确有着很大的差别：语言学家是从小处着手，处处关心语言研究可以给我们的语言知识增加更多的新内容；但哲学家则从大处着眼，更为重视我们对语言的意义理解和思想把握。如果我们试图关心语言的具体用法，意图更多地了解关于语言的知识，语言学家们的工作就可以满足这样的要求。然而，如果我们想要深入地理解语言的性质，把握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那么，我们就必须知道哲学家们在语言研究中提出的重要思想。

最后，语言学家们的工作可以使我们更多地了解各种不同语言的构成规则及其使用方式，在增加知识的意义上改进我们对语言的理解。但是，如果语言学家们试图从他们得到的关于具体语言研究的成果中得到关于语言性质的一般理解，那么，他们的想法显然就超出了语言学研究的范围，而进入了哲学研究的领域。有趣的是，事实上，几乎每一位语言学家似乎都有这样的哲学抱负，而且，被誉为伟大的语言学家的主要特征，正是由于他们在语言学研究中的哲学贡献。这也正符合了历史上的真实情况，即语言学的每一次进步，其实也都是哲学上的一次进步。应当说，语言学的每一发展都是由于其背后的哲学推动力，或者说，正是由于语言学家能够从哲学的视角看待语言，处理语言问题，他们的语言学理论才真正具有了更为普遍的价值和深远的影响力，这无论是对洪堡、索绪尔还是对布龙菲尔德、乔姆斯基都是如此。洪堡在语言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正是由于他对语言与人类精神之间关系的深刻思想；索绪尔对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等的区分不仅开启了语言学研究的新纪元，更重要的是使我们更加清楚了语言的根本性质；比较语言学的研究从更为广泛的范围考察了语言的性质和作用，为哲学理性主义观念的确立提

供了有力的语言基础；而乔姆斯基的工作更是从语言与心灵的关系入手，明确建立了语言与思想之间的转换结构。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语言学研究的进步必须从哲学的视角出发才有可能。

当然，我们这样评价语言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丝毫没有贬低语言学研究之意；相反，我们认为，对语言的哲学研究也只有在大量的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更为恰当地说，语言哲学中的任何研究都要以对语言的充分了解为基础，而语言学研究中取得的任何成果也只有赋予了哲学上的意义才能获得更大的价值。

目 录



如何从哲学的视角研究语言（代序）	江 怡 1
------------------------	-------

第一篇 结构主义的语言观

为什么是索绪尔？	张妮妮 3
德里达的“解构”之路	赵 铮 15
知识考古学和话语自主性理论	陶秀璈 24
从方法论视角看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	王立志 72

第二篇 分析学派的语言观

Bickerton 的进化主义语言本质观	董方峰 85
生物理性主义——继承与发展	程 芳 96
认知语言学的体验哲学观	张 莎 112
乔姆斯基生成语法的发展及理论特征	王欣春 120
论蒯因的翻译不确定性论题	杨志红 128

家族相似性、语言游戏说与语言学	贾冬梅 137
结构的重复：拉康解读《被窃的信》	刘立平 142

第三篇 拉康的语言观

拉康和索绪尔的渊源	齐冬冬 151
拉康的隐喻观与认知隐喻观	徐莲, 祝信 158
分裂的堂吉诃德	张 凯 167
对拉康“无意识是他者话语”的重新解析	王洁卿 175

第四篇 文化视角中的语言研究

海德格尔的“语言转向”	杨佑文 187
斯温伯恩的宗教语言观	胡自信 196
语篇研究在柬埔寨语教学中的应用	梁 鹏 206
阿拉伯语篇章连贯性的实现与理解	邹冬心 217
从阿拉伯语对外来词的借入看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特点	张睿亮 268
曲艺“包袱儿”中的哲学意蕴	桂 靖 279
洪堡特语言理论的文化哲学解读	高 莉 287
文化是存在者的创造	姚小平 295
公孙龙认知语言学思想的理性主义倾向	刘利民 302
浅析先秦正名学说中的符号学思想	杨 文 313
道·言·人——老庄“道言”问题的一种阐释	李 勇 323

第一篇



结构主义的语言观

为什么是索绪尔？

张妮妮

作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开创者，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贡献是与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联系在一起的。1907 至 1911 年间，索绪尔在日内瓦大学三度开设普通语言学课程，在这期间，他提出了具有符号学性质的现代普通语言学理论。然而索绪尔没有完整的讲稿，没有写过相关的著作。直到去世之后，他的学生巴利（Charles Bally）和薛施蔼（Albert Sechehaye）等根据同学们的笔记和索绪尔的一些手稿及其他材料编辑整理成了《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教程》“以第三度讲课为基础，但利用我们 [编纂者] 手头的全部资料，包括德·索绪尔个人的札记”，进行“重新组织”、“综合”和“再创造”^①，于 1916 年在法国巴黎首次出版。《教程》的编撰与出版，为索绪尔思想的公之于世创造了条件。

不过，1916 年并不是索绪尔进入结构主义思潮视野的时间，甚至他的语言学理论也还没有被视为“结构主义的”。事实上，是后来社会文化研究领域中的结构主义者发现了索绪尔。

首先是列维-斯特劳斯。19 世纪 30 年代，在孔德、涂尔干社会整体论的背景下，斯特劳斯进入了人类学的经验研究。之后，他受到马克思的影响，认为表层现实并不是最重要的，研究者必须建构一个模型，以超越物质表象，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5，第 13 页。

深入现实的根基。1939年，因为德军入侵，斯特劳斯被迫离开法国去美国避难，来到纽约的社会研究新校（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鲍阿斯的人类学研究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到纽约，列维-斯特劳斯就立刻找出了弗朗茨·鲍阿斯的著作，”^①他对斯特劳斯的影响，就在于从文化现象的无意识本质中发现了语言法则的核心作用。后来，也是在纽约新校，斯特劳斯与雅各布森相识，这是一次历史性的邂逅。从此，斯特劳斯开始自觉地以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思想为指导来进行人类学的研究。他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那个时候，我只是一个朴素的结构主义者。我正在搞结构主义，但对其一无所知。雅各布森向我展示了蕴含着某种学说的工作，这种学说已经融入语言学中，而我却从来没有研究过它。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次启蒙。”^②敦促斯特劳斯撰写论著的，也是雅各布森。1948年，斯特劳斯发表了他的代表性著作《血族关系的基本结构》。正是在这本书中，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原则得到了根本的体现。他多次提及索绪尔对能指和所指的区分以及符号的任意性原则，并用于研究血族关系，血族关系系统是一种语言。通过雅各布森，斯特劳斯把索绪尔的革命转化成了人类学的革命，把索绪尔的语言学提升到了带头学科的高度。

再来看罗兰·巴特，1953年，他的《写作的零度》出版，这本书反响很大，预示了某种崭新的文学观念的形成。即他不再把写作承担的义务置于内容之中，而是置于形式之上。写作即风格，纯洁的写作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绝没有和意识形态无关的诸如“精确”、“明晰”这样的超历史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风格模式或条件。语言成了最终因素，它与重获自由是完全一致的。在此之前，巴特因无法在传统大学中寻求安身立命之地，于1948年离开法国来到罗马尼亚，1949年又去埃及。在埃及，他遇到了格雷马斯，一个推崇索绪尔思想的语言学家。格雷马斯建议巴特读一读索绪尔和叶姆斯列夫的著作，而巴特让格雷马斯阅读他的作品。在卡尔韦的《罗兰·巴特》中记录了格雷马斯对巴特的评论：“‘很好，不过你应该读一读索绪尔的著作。’‘索绪尔是

^① 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第21页。

^② 列维-斯特劳斯，《近在眼前与远在天边》，第63页。转引自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第30页。

谁?’巴特问。‘可不能不知道索绪尔是谁。’格雷马斯回答道，好像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①而格雷马斯认为，叶姆斯列夫是索绪尔的真正传人，只有他明白索绪尔的意图，并最终清晰明确地把它概括出来。巴特显然接受了格雷马斯的建议，也知道了叶姆斯列夫和雅各布森是什么人。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带着巴特起飞了，伴随着他的《神话学》和《符号学原理》，使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真正成了有创造性的文学结构主义者。

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流传来看，1916—1960年间，它只有5种译本；1960—1980年间，它有12种译本。随着梅洛-庞蒂、列维-斯特劳斯、巴特以及拉康的不断援引，《普通语言学教程》最终成为结构主义的经典。

为什么是索绪尔？为什么是语言学？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从未用过“结构主义”一词，只是138次用了“系统”一词；该书发表于1916年，却在四五十年之后走红；该书是地道的语言学著作，却在语言学之外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固然有不少偶然的因素，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知识分子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和思想碰撞、有人把索绪尔的讲课笔记整理出来、出版并在国际语言学大会上引用他的思想、社会运动造成的在不同学科之间所共同关心的问题等等，但一系列的巧合应该可以引起我们对索绪尔语言系统思想在更大范围内得到解读的兴趣。

显然，语言学成了方法论，成了领航学科。这个道理可以在另一件类似的事情上得到印证：英国的哲学也在20世纪最初的十几年内转向了语言学。这是从发现语言的新逻辑开始的。由弗雷格创立的符号逻辑使人们意识到，对语言意义的逻辑分析可以从根本上避免人们对语言意义的曲解，进而重新认识人类知识的本质、重新看待我们认识的世界。经过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工作，在欧洲大陆之外的英美哲学开始了分析哲学的历程，分析哲学家通过庞大而专业的逻辑分析及语义分析，把一种新的哲学观带到了哲学研究的领域。

^① 路易-让·卡尔韦《罗兰·巴特》，Flammarion，1990，第124页。转引自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大潮》，第91页。